

苹果为什么落不远？农民工经济融合代际传递的理论分析

杜凤莲*

内容提要 中国发生了世界上最大规模的劳动力流动，然而因为户口等制度性障碍，农民工与流入地居民之间存在社会分割。本文根据代际传递理论发现，农民工群体存在着代际传递，在没有外部政策干预条件下，经济分割会因代际传递而持续。本文主要结论如下：首先，因为农民工平均收入低于城镇人口，农民工人力资本投资弹性低，导致农民工对孩子人力资本投资低于城镇人口，经济隔离存在着代际传递趋势。其次，在祖父母对孩子有着直接和间接影响时，祖父母对孩子的经济隔离会产生隔代传递效应，这会进一步恶化农民工经济隔离问题。再次，在农民工社会资本较低的情况下，把家庭的社会资本作为外部因素来考察，我们会发现农民工子女收入函数的截距低于城镇当地居民。最后，在农民工对子女的人力资本投资存在流动性约束时，农民工的经济融合趋势会进一步恶化。因此，政府需要通过建立流动人口教育基金等措施打破经济分割的代际传递。

关键词 农民工 经济融合 代际传递

一 研究背景

中国劳动力流动速度和流动规模都堪称世界第一，农民工社会融合问题严峻。城乡劳动力流动使得城乡二元结构演变成为城市不同劳动力群体的二元结构，于是，在中国城市劳动力市场产生了大量处于弱势地位的人口群体，他们是城市贫困人口的主要构成部分（王朝明、申晓梅，2005）。而农民工的这种社会分层会伴随着城乡二元经

* 杜凤莲，内蒙古大学经济管理学院，电子邮箱：dufenglian@126.com。感谢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苹果为什么落不远？农民工人力资本与经济融合的代际传递”的资助（项目号：71373111）。

济结构而持续存在，农民工社会融合问题呈现出长期化趋势。从第一代农民工到第二代农民工，再到流动/留守儿童，已经经历了三代人，农民工社会融合问题依然严峻。

中国流动人口社会融合问题的复杂性推动着理论的进步。劳动力融合以及代际传递理论研究主要集中在西方发达国家，而这些国家有着相对统一的劳动力市场，所以流动人口的融合问题主要研究第一代流动人口的融合问题。在中国二元经济结构以及户口等阻碍城乡劳动力流动的的制度背景下，中国城市劳动力市场不仅有老一代农民工的社会融合问题，还会不断产生新一代农民工的融合问题。中国农民工社会融合呈现收敛还是发散趋势？本文拟把代际传递理论引入流动人口分析，并结合农民工现实状况，把代际传递理论分析进行扩展，以期从理论上分析农民工经济融合趋势。

二 文献综述

2011年，中国流动人口数量达到2.3亿，城乡流动人口占80%，流动人口低收入家庭比重大（国家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流动人口服务管理司，2012）。而城市流动人口又是构成城市贫困的主要组成部分，一方面因为流动人口的人力资本较低，另一方面因为流动人口受到制度性排斥（Tao，2010）。就业上，存在着职业分割与工资歧视（Meng & Zhang，2001）；社会福利方面，他们被排斥在城市低保、城市保障性住房之外；他们的子女被排斥在当地公立幼儿园、小学、中学之外（Tao，2010）。为了实现十八大提出的改善民生目标，我们还需要了解流动人口人力资本与社会分层的代际传递程度以及传导机制。如果不从机制上阻断社会分层的传导机制，农村转移劳动力就业问题就会持续存在。

Chiswick（1978），Borjas（1999），Borjas，Bronars & Trejo（1992）利用工资趋同模型研究劳动力流动对迁移者收入的影响，进而对社会融合（主要以经济融合为代表）的影响，研究发现移民最终可以超过当地劳动力在劳动力市场上的表现。而对中国的研究却与上述结论不一致。张丹丹（2012）利用相同的方法，发现可能由于中国城市劳动力市场的制度性障碍，使得农民工即使不断努力也无法摆脱与城市当地居民的工资差距。钱雪亚、张昭时和姚先国（2009）发现在城市劳动力市场上，与城市居民劳动力群体相比，相对高端就业的农民工存在着就业机会不均等问题，而相对低端就业的农民工则存在着同工不同酬问题。邢春冰（2008）发现与城镇职工相比，农民工存在着工资歧视；进一步地，李实和杨修娜（2010）发现在农民工内部，女性农民工比男性农民工受到的歧视更为严重。姚先国和赖普清（2004）的研究发现，农民工在工

资、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失业保险以及工会参与等方面均遭到户籍歧视，由此导致农民工人力资本投资动力下降（姚先国、孙景蔚，2006）。流动人口与当地居民存在着劳动力市场分割（Meng, 2000; Meng & Zhang, 2001; Du et al., 2006; Park et al., 2006; Zhang, 2009）和社会保障分割（张展新、侯亚非，2009）。Wang et al. (2010) 还发现流动人口与本地人口存在着居住隔离，城中村（urban village）和私人业主（private landlord）是流动人口住所的主要提供者；孟庆洁（2009）以及张展新和侯亚非（2009）也得出了类似结论，他们的研究证实流动人口与本地居民存在着居住隔离，这大大限制了农民工的社会交往范围。

劳动力市场一体化会促进经济增长，改善经济效率，然而农民工与本地居民之间存在着二元劳动力市场分割。代际流动理论认为人力资本与社会阶层具有代际传递性（Solon, 1999），如果这种传递在本地居民与农民工内部分别进行，那么中国经济就会损失很多效率，并且随着城乡流动人口的增多，会导致城乡间不公平向城市内部不同群体间不公平的演变。代际社会流动（intergenerational social mobility）对经济增长具有显著正向影响。Hassler & Mora（2000）的研究发现，代际社会流动会导致经济实现内生增长，并证明代际社会流动是资本主义社会经济财富创造的最核心因素。

Black & Devereux（2010）认为，1999年之前关于代际传递的研究一直致力于代际传递规模的计量（包括传递弹性与相关系数），而1999年之后，则致力于研究代际传递的机制以及驱动因素研究。

（1）代际传递的规模。代际传递规模一般使用代际弹性（intergenerational elasticity，指孩子收入对父母收入的反应敏感程度）、代际相关系数（intergenerational correlation，是在代际弹性的基础上剔除了两代人收入标准差，如果两代人收入标准差相等，代际相关系数等于代际弹性）和转换矩阵（transition matrices，转换矩阵的优势在于可以计算不同分位收入水平上人群的代际传递规模）来衡量。代际传递弹性或者代际相关系数越高，不同社会阶层人群的流动性就越低。

人力资本和收入代际传递规模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北美和欧洲，且一般研究父亲与儿子的代际传递弹性。Mazumder（2005）认为美国代际传递弹性为0.5~0.6。英国代际收入弹性为0.3，北欧国家弹性低于0.3（Nicoletti & Ermisch, 2007; Blanden et al., 2004）。Solon（1992）发现美国代际收入传递相关系数为0.4，说明美国社会代际流动性远远低于人们所认为的程度。Jäntti et al.（2006）利用转换矩阵发现，相对于北欧国家，美国和英国的低收入和高收入分位人群的流动性差、代际传递显著，中间收入分位人群的代际传递在不同国家间没有明显差异。Jäntti et al.（2006）计算了女儿与父亲的代际收入弹性，

发现女儿的代际传递弹性低于儿子。Hertz et al. (2008) 计算了人力资本的代际传递规模，发现南美国家教育的代际传递弹性最高，为 0.6，西欧国家教育的代际传递弹性为 0.4，英国教育的代际传递弹性为 0.46，北欧国家教育的代际传递弹性最低。Solon (1999) 利用兄弟姐妹以及社区数据证实了代际传递效应的存在，并计算了传递规模。

(2) 代际传递的机制和驱动因素。Becker & Tomes (1986, 1979) 以家庭效用最大化为目标，把孩子未来收入纳入效用函数，构建模型，发现孩子的收入与家庭遗传、人力资本投资、家庭社会资本等特征密切相关。Solon (2013) 把 Becker & Tomes 模型扩展到适用多代人的分析。Lee & Solon (2009) 发现美国代际收入传递一直存在。Borjas (1992) 发现美国少数民族的人力资本不仅与其父母的人力资本特征有关，还与同其父母交往的人群特征有关；Borjas & Sueyoshi (1997) 发现出生在接受救济家庭的孩子未来更有可能依靠社会福利来生存；Black et al. (2005, 2009) 发现家庭特征和遗传特征对人力资本的代际传递起到同样重要的作用。Bjorklund, Jantti & Solon (2007) 发现先天遗传以及后天培养对经济社会地位的代际传递都起到重要作用。Ichino, Karabarbounis & Moretti (2011) 发现社会政治经济因素是导致收入代际传递的重要因素。邢春冰 (2006) 发现中国农村流动人口非农就业机会具有代际传递性。姚先国、黄志岭和苏振华 (2006) 发现家庭背景好的孩子的教育回报率较高；而母亲的受教育程度对子女的教育投资有着更为显著的积极影响 (齐良书, 2012)。杜凤莲、张麟和张晓敏 (2014) 发现中国的父亲和母亲对孩子的教育代际传递弹性分别为 0.33 和 0.44，但这种代际影响在下降。Owen & Weil (1998) 发现较高的代际流动会伴随较低的收入差距、更有效的教育和更高的经济产出水平。

(3) 中国流动人口人力资本积累与劳动力市场分割。农民工的受教育水平偏低，具有初中及以下文化程度的占 73.8% (国家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流动人口服务管理司, 2012)。任远 (2012) 发现学历偏低、技术不足是困扰流动人口的问题。赵延东、王奋宇 (2002) 的研究结果表明城乡流动人口的人力资本对其经济地位获得有着重要的影响。孟庆洁 (2009) 的研究发现流动人口的教育支出占总支出的比重显著低于当地居民。Wang & Yin (2011) 的研究发现流动儿童的辍学率更高。

新生代农民工占劳动年龄农民工的 44.84% (国家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流动人口服务管理司, 2012)。随着新生代流动人口进入婚育期，子女教育问题越来越成为他们主要关注的问题 (国家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流动人口服务管理司, 2012)。根据段成荣等 (2012) 的统计，2005 年中国 0~14 周岁流动儿童的数量达到 1833 万人，留守儿童数量达到 6055 万人 (其中单亲留守儿童占 46.44%，双亲留守儿童占 53.56%)。有

64.7%的留守老人需要照顾孙子女（国家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流动人口服务管理司，2012），孩子的安全、成长和教育是重要问题。蔡昉（2011）指出流动儿童、留守儿童的教育问题将会对中国未来社会人力资本构成产生不乐观影响。

中国有着世界最大规模的流动人口，关于流动人口的研究也比较多，主要集中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是对劳动力流动理论的应用——利用中国数据验证劳动力流动理论；二是研究劳动力流动对流入地、流出地以及劳动者自身的影响。而关于劳动力代际传递的文献较少。

代际传递理论模型构成了本研究的基本框架，但是目前该模型还没有应用于流动人口的研究。Black & Devereux（2010）指出当前关于人力资本和收入代际传递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欧美国家，而欧美等西方发达国家城乡劳动力市场相对统一，关于流动人口人力资本和社会分层代际传递的研究较少。Borjas（1993）是个例外，他发现第二代移民的收入水平与第一代移民收入水平显著正相关；Borjas（2006）发现移民的这种代际影响在第三代就不存在了。关于中国流动人口代际传递规模以及驱动因素研究就更少了。

整体上，无论从经济效率还是社会公平角度而言，迁移经济学理论和实证研究大都支持鼓励劳动力流动的政策（Lall, Selod & Shalizi, 2006）。然而，户籍等制度依然是限制城乡劳动力流动的因素（Bao, Bodvarsson, Hou & Zhao, 2011）。这样，中国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就转化为城市内部不同群体间二元分割，并导致了中国农民工与流入地融合问题的长期化。中国流动人口有其自身特点：留守（或者随迁）老人帮助照顾孩子；流动人口的社交圈较为狭窄；由于整体收入较低，在孩子人力资本投资方面可能存在流动性约束；两代农民工流动模式正在发生变化。所以在代际传递分析上有必要从两代扩展到三代，并根据流动人口特点对代际传递模型进行修正。

三 代际传递理论基本模型以及应用

人力资本代际传递理论模型的构建有助于解释当前存在的农民工社会分层现象，并根据已有现实推演未来走向；理论模型的构建还有助于为后续人力资本代际传递经验研究提供分析框架。

（一）模型假设

假设1：追求效用最大化家庭*i*把家庭收入 $y_{i,t-1}$ 在家庭消费 $C_{i,t-1}$ 和孩子投资 $I_{i,t-1}$ 间进行分配。

$$y_{i,t-1} = C_{i,t-1} + I_{i,t-1} \quad (1)$$

假设 2：家庭对孩子的投资转化为孩子的人力资本 $h_{i,t}$ 。

$$h_{i,t} = \theta \ln(I_{i,t-1}) + e_{i,t} \quad (2)$$

θ 表示人力资本投资的边际产品，且 $\theta > 0$ ； $e_{i,t}$ 表示孩子其他人力资本禀赋，包括遗传的能力水平、家庭文化熏陶、家庭社会资本等。

假设 3：根据 Becker & Tomes (1979)，假设孩子其他人力资本禀赋（包括遗传的能力水平、家庭文化熏陶、家庭社会资本等）满足一阶自回归过程。

$$e_{i,t} = \delta + \lambda e_{i,t-1} + v_{i,t} \quad (3)$$

其中， λ 表示其他人力资本禀赋代际传递自回归相关系数，且 $0 < \lambda < 1$ 。

假设 4：孩子收入取决于其人力资本水平。

$$\ln(y_{i,t}) = u + \rho h_{i,t} = u + \theta \rho \ln(I_{i,t-1}) + \rho e_{i,t} \quad (4)$$

令 $\gamma = \theta \rho$ ，表示孩子人力资本投资的收入弹性，即人力资本投资的回报率。

(二) 模型求解

把假设 1~4 代入家庭效用模型 $U_i = (1 - \alpha) \ln(C_{i,t-1}) + \alpha \ln(y_{i,t})$ ，并求解得到：

$$I_{i,t-1} = \{\alpha \gamma / [1 - \alpha(1 - \gamma)]\} y_{i,t-1} \quad (5)$$

其中 α 被称为利他指数，该数值越高，表示家庭用在孩子身上的人力资本投资越高。

把公式 (5) 代入公式 (4)，并考虑 $y_{i,t-1}$ 和 $e_{i,t}$ 都与父母的个人禀赋特征 $e_{i,t-1}$ 相关，得到： $\ln(y_{i,t}) = u^* + \gamma \ln(y_{i,t-1}) + \rho e_{i,t}$ ，其中， $u^* = u + \gamma \ln\{\alpha \gamma / [1 - \alpha(1 - \gamma)]\}$ 。

进而可以计算稳态下收入代际传递弹性的理论值 (Solon, 2013)：

$$\beta = (\gamma + \lambda) / (1 + \gamma \lambda) \quad (6)$$

利用公式 (5)，我们可以分析农民工与本地人口对孩子人力资本投资的行为：即利他指数越高、收入越高、人力资本投资回报率越高，则对孩子的人力资本投资水平就越高。我们假设农民工利他指数与流入地人口相同。然而流动人口收入相对较低，2011 年，城镇单位在岗职工平均月工资 3538 元（国家统计局，2012），农民工月工资均值是 2240 元（国家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流动人口服务管理司，2012），仅相当于城镇单位在岗职工的 63%。这就是说，即使其他条件相同，农民工因为收入差距而用于孩子人力资本的投资仅相当于当地职工的 63%。如果农民工人力资本投资回报率 γ 也较低的话，则农民工对孩子的人力资本投资水平会更低。由此我们可以判断，在没有外部政策因素干预的情况下，农民工与当地人口的经济融合，会出现扩散趋势。

如果估算出人力资本投资回报率 γ 和其他人力资本禀赋代际传递自回归相关系数 λ ，我们就可以从理论上估算收入的代际传递弹性 β 。例如，假设当地居民人力资本投

资回报率为30%，农民工人力资本回报率为20%；假设其他禀赋代际传递自回归相关系数为0.3，则当地居民和农民工代际收入传递系数分别为0.55和0.47。说明父辈收入对当代居民收入的影响还是非常高的。如果人力资本投资回报率 γ 和其他人力资本禀赋代际传递自回归相关系数 λ 提高，则父辈对当代的收入传递弹性还会进一步提高。这就说明在中国城市劳动力二元结构既定事实条件下，如果没有外部政策干预，农民工的经济融合问题将越来越严峻。

四 农民工经济代际融合模型的扩展

以上分析提供了代际传递基础模型，基于国内流动人口的实际情况，本模型至少可以做以下扩展。

扩展1：多代代际传递。调查显示中国有64.7%的留守老人需要照顾孙子女（国家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流动人口服务管理司，2012）。杜凤莲（2008）的研究发现孩子与爷爷奶奶（或者外公外婆）住在一起会提高其母亲的劳动参与率，这会间接提高孩子的人力资本投资水平。那么，爷爷奶奶（或者外公外婆）是否会对孩子的人力资本投资产生直接影响？爷爷奶奶（或者外公外婆）对孩子人力资本投资会加速农民工经济融合抑或降低融合速度？

假设爷爷奶奶、外公外婆对孩子收入的影响除了通过影响父母进而间接影响孩子收入之外，还可能产生直接影响（Solon，2013），于是：

$$e_{i,t} = \delta + \lambda_1 e_{i,t-1} + \lambda_2 e_{i,t-2} + v_{i,t} \quad (7)$$

在这里， $0 \leq \lambda_2 < \lambda_1 < 1$ 。以公式（7）代替公式（3），并利用与基本模型相同的求解方法，得到：

$$\ln(y_{i,t}) = u^{**} + (\gamma + \lambda_1) \ln(y_{i,t-1}) + (\lambda_2 - \gamma\lambda_1) \ln(y_{i,t-2}) - \gamma\lambda_2 \ln(y_{i,t-3}) + pv_{i,t} \quad (8)$$

令 $u^{**} = (1 - \lambda_1 - \lambda_2)(u^* + p\delta)$ ，与基本模型结果相同，父母对孩子的影响为正；在 $\lambda_2 > \gamma\lambda_1$ 时，祖父母对孩子的代际影响也为正；在扣除通过父母、祖父母对孩子的间接影响之后，曾祖父母对孩子代际传递的直接影响为负。公式（8）说明祖父母、父母的收入差距通过人力资本投资、遗传、社会关系网络等渠道会导致孩子的收入差距。这也进一步说明一旦农民工与当地人口产生经济隔离，在没有外部政策干预的情况下，这种经济隔离会产生代际传递；在一定条件下，隔代代际传递还会使这种隔离更加严重。

扩展2：流动人口的社会资本效应。相对于本地人口，农民工的社会资本更少一

些，农民工较少的社会资本会对经济融合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在本文的基本模型和扩展 1 模型下，社会资本效应在模型中表现为孩子收入方程中的常数项，即基本模型中的 u 、 u^* 或者 u^{**} 较高，这说明农民工社会资本的差异会导致农民工孩子的收入水平系统地低于当地人口。

扩展 3：流动性约束。农民工收入相对较低，是否存在对孩子人力资本投资的流动性约束？如果流动性约束存在，农民工会有什么样的反应？流动性约束对经济融合的影响路径是什么？

在本文的基本模型和扩展模型中，我们假设一个家庭对孩子的人力资本投资 $I_{i,t-1}$ 是内生决定的，即不存在流动性约束。这样农民工子女收入会随着父母收入的增加而增加，只是增加速度会低于当地城镇人口。然而，在农民工收入水平较低条件下，不仅会减少对下一代人力资本的投资额，在一定条件下，还可能因为流动性约束而使得对孩子的人力资本投资低于最优投资水平，从而使得农民工子女的经济融合度更低。

五 主要结论与政策建议

2011 年，中国流动人口已经达到 2.3 亿。中国传统的城乡隔离在劳动力流动条件下，不仅没有改善城乡差距，还导致了城市内部的二元经济，即农民工与当地城镇人口的隔离。提高农民工融合度无疑是促进社会公平、改善经济效率的重要途径。本文的理论分析表明在没有社会外部政策干预的条件下，农民工与当地居民的经济隔离存在着代际传递，经济隔离不会自动消失。

本文主要结论如下：第一，因为农民工平均收入低于城镇人口，农民工人力资本投资弹性低，导致农民工对孩子人力资本投资低于城市人口，经济隔离存在着代际传递趋势。第二，在祖父母对孩子有着直接和间接影响时，祖父母对孩子的经济隔离会产生隔代传递效应，这会进一步恶化农民工经济隔离问题。第三，在农民工社会资本较低的情况下，把家庭的社会资本作为外部因素来考察，我们会发现农民工子女收入函数的截距系统地低于城镇当地居民，结合代际传递的结论，我们会发现农民工经济融合的难度更大。第四，在农民工对子女的人力资本投资存在流动性约束时，农民工的经济融合趋势会进一步恶化。

在上述结论的基础上，本文提出以下建议：第一，通过新型城镇化，切实推进同工同酬，建立农民工收入保障制度。第二，鼓励居家迁移，切实落实流动儿童在流入地享受同等教育权利，对低收入家庭实施教育救助制度。第三，建立农民工素质培育

学校,改善农民工居住环境,解决农民工居住隔离问题,扩大农民工社会交往范围,提高农民工政治参与范围和参与程度。

六 研究展望

本文只是较为初步的研究,在后续研究中将着重深化以下问题:第一,把农民工社会资本变量内生,同时考察人力资本投资和社会资本变化对农民工经济融合的影响。第二,把流动性预算约束问题模型化,把流动性约束对农民工经济融合的影响定量地表达出来。第三,对以上理论模型进行经验检验。

参考文献:

- 蔡昉(2011),《“十二五”时期中国经济发展五大挑战》,载于蔡昉主编《中国人口与劳动问题报告 No. 12——“十二五”时期挑战:人口、就业和收入分配》,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第23-35页。
- 杜凤莲(2008),《家庭结构、儿童看护与女性劳动参与:来自中国非农村的证据》,《世界经济文汇》第2期,第1-12页。
- 杜凤莲、张麟、张晓敏(2014),《有其父必有其子吗?中国教育代际传递的规模与机制》,2014年中国经济学年会汇报论文。
- 段成荣、杨舸、马学阳(2012),《中国流动人口研究》,北京:中国人口出版社。
- 国家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流动人口服务管理司(2012),《中国流动人口发展报告》,北京:中国人口出版社。
- 国家统计局(2012),《中国统计年鉴》(2012),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
- 李实、杨修娜(2010),《农民工工资的性别差异及其影响因素》,《经济社会体制比较》第5期,第82-89页。
- 孟庆洁(2009),《上海市外来流动人口的生活方式研究》,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 齐良书(2012),《家庭内部资源配置中的性别差异》,载于张莉琴、杜凤莲、董晓媛主编《社会性别与经济发展:经验研究方法》,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第256-289页。
- 钱雪亚、张昭时、姚先国(2009),《城镇劳动力市场城乡分割的程度与特征——基于

- 浙江数据的经验研究》，《统计研究》第12期，第23-31页。
- 任远（2012），《城市流动人口的居留模式与社会融合》，上海：上海三联书店。
- 王朝明、申晓梅（2005），《中国21世纪城市反贫困战略研究》，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
- 邢春冰（2006），《中国农村非农就业机会有代际流动》，《经济研究》第9期，第103-116页。
- 邢春冰（2008），《农民工与城镇职工的收入差距》，《管理世界》第5期，第55-64页。
- 姚先国、黄志岭、苏振华（2006），《家庭背景与教育回报率——基于2002年城镇住户调查数据》，《中国劳动经济学》第4期，第19-29页。
- 姚先国、赖普清（2004），《中国劳资关系的城乡户籍差异》，《经济研究》第7期，第82-90页。
- 姚先国、孙景蔚（2006），《我国农民市民化进程中的人力资本投资分析》，《中国劳动经济学》第3期，第86-96页。
- 张丹丹（2012），《流动人口社会融合的性别差异：工资融合模型》，载于张莉琴、杜凤莲、董晓媛主编《社会性别与经济发展：经验研究方法》，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第200-227页。
- 张展新、侯亚非（2009），《城市社区中的流动人口——北京等6城市调查》，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 赵延东、王奋宇（2002），《城乡流动人口的经济地位获得及决定因素》，《中国人口科学》第4期，第8-15页。
- Bao, Shuming, Örn Bodvarsson, Jack Hou & Yaohui Zhao (2011). The Regulation of Migration in a Transition Economy: China's Hukou System. *Contemporary Economic Policy*, 29(4), 564-579.
- Becker, Gary & Nigel Tomes (1986). Human Capital and the Rise and Fall of Families. *Journal of Labor Economics*, 4(1), 1-39.
- Becker, Gary & Nigel Tomes (1979). An Equilibrium Theory of the Distribution of Income and Intergenerational Mobility. *The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87(6), 1153-1189.
- Bjorklund, Anders, Markus Jantti & Gary Solon (2007). Nature and Nurture in the Intergenerational Transmission of Socioeconomic Status: Evidence from Swedish Children and Their Biological and Rearing Parents. *Advances in Economic Analysis & Policy*, 7(2),

1753 – 1753.

- Black, Sandra & Paul Devereux (2010). Recent Developments in Intergenerational Mobility. *NBER Working Paper*, No. 15889.
- Black, Sandra, Paul Devereux & Kjell Salvanes (2009). Like Father, Like Son? A Note on the Intergenerational Transmission of IQ Scores. *Economics Letters*, 105(1), 138 – 140.
- Black, Sandra, Paul Devereux & Kjell Salvanes (2005). Why the Apple Doesn't Fall Far: Understanding Intergenerational Transmission of Human Capital.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95(1), 437 – 449.
- Blanden, Jo, Alissa Goodman, Paul Gregg & Stephen Machin (2004). Changes in Intergenerational Mobility in Britain. In Miles Corak (ed.), *Generational Income Mobility in North America and Europ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pp. 122 – 146.
- Borjas, George (2006). Making it in America: Social Mobility in the Immigrant Population. *The Future of Children*, 16(2), 55 – 71.
- Borjas, George (1999). The Economic Analysis of Immigration. In Card Ashenfelter (ed.), *Handbook of Labor Economics*, 3A. Amsterdam: Elsevier, pp. 1697 – 1760.
- Borjas, George & Glenn Sueyoshi (1997). Ethnicity and the Intergenerational Transmission of Welfare Dependency. *Research in Labor Economics*, 16(2), 271 – 295.
- Borjas, George (1993). The Intergenerational Mobility of Immigrants. *Journal of Labor Economics*, 11(1), 113 – 135.
- Borjas George, Stephen Bronars & Stephen Trejo (1992). Assimilation and the Earnings of Young Internal Migrants. *Review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 74(1), 170 – 175.
- Borjas, George (1992). Ethnic Capital and Intergenerational Mobility.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07(1), 123 – 150.
- Chiswick, Barry (1978). The Effect of Americanization on the Earnings of Foreign-Born Men.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86(5), 897 – 921.
- Du, Yang, Robert Gregory & Xin Meng (2006). Impact of the Guest Worker System on Poverty and Wellbeing of Migrant Workers in Urban China. Unpublished Monograph.
- Hassler, John & Jose Rodríguez Mora (2000). Intelligence, Social Mobility and Growth. *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90(4), 888 – 908.
- Hertz, Tom, Tamara Jayasundera, Patrizio Piraino, Sibel Selcuk, Nicole Smith & Alina Verashchagina (2008). The Inheritance of Educational Inequality: International

- Comparisons and Fifty-Year Trends. *The B. E. Journal of Economic Analysis & Policy*, 7 (2), 1935 – 1682.
- Ichino, Andrea, Loukas Karabarbounis & Enrico Moretti (2011).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Intergenerational Income Mobility. *Economic Inquiry*, 49(1), 47 – 69.
- Jäntti, Markus, Bernt Bratsberg, Knut Røed, Oddbjørn Raaum, Robin Naylor, Eva Österbacka, Björklund Anders & Tor Eriksson (2006). American Exceptionalism in a New Light: A Comparison of Intergenerational Earnings Mobility in the Nordic countries, the United Kingdom and the United States. *Discussion Paper*, No. 1938, Institute for the Study of Labor (IZA), Bonn.
- Lall, Somik, Harris Selod & Zmarak Shalizi (2006). Rural-Urban Migration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World Bank Policy Research Working Paper* 3915.
- Lee, Chul-In & Gary Solon (2009), Trends in Intergenerational Income Mobility. *Review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 91(4), 766 – 772.
- Mazumder, Bhashkar (2005). Fortunate Sons: New Estimates of Intergenerational Mobility in the U. S. Using Social Security Earnings Data. *Review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 87(2), 235 – 255.
- Meng, Xin & Junsen Zhang (2001). The Two-Tier Labor Market in Urban China, Occupational Segregation and Wage Differentials between Urban Residents and Rural Migrants in Shanghai. *Journal of Comparative Economics*, 29(3), 485 – 504.
- Meng, Xin (2000). *Labour Market Reform in China*.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Nicoletti, Cheti & John Ermisch (2007). Intergenerational Earnings Mobility: Changes across Cohorts in Britain. *The B. E. Journal of Economic Analysis and Policy*, 7(2), 777 – 826.
- Owen, Ann & David Weil (1998). Intergenerational Earnings Mobility, Inequality and Growth. *Journal of Monetary Economics*, 41(1), 71 – 104.
- Park, Albert, Dwen Wang & Fang Cai (2006). Migration and Urban Poverty and Inequality in China. Unpublished Monograph.
- Solon, Gary (2013). Theoretical Models of Inequality Transmission across Multiple Generations. *NBER Working Paper*, No. 18790.
- Solon, Gary (1999). Intergenerational Mobility in the Labor Market. In Card Ashenfelter (ed.), *Handbook of Labor Economics*, 3A. Amsterdam: Elsevier, pp. 1761 – 1800.
- Solon, Gary (1992). Intergenerational Income Mobility in the United States. *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82(3), 393 – 408.

Tao, Ran(2010). Achieving Real Progress in China's *Hukou* Reform. Accessed February 8, <http://www.eastasiaforum.org/2010/02/08/achieving-real-progress-in-chinas-hukoureform/>.

Wang, Wenbin & Heng Yin(2011). Dropping out of Floating Children in China: Explanation and Evidence. Paper presented at the CCES and CESA Joint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Transition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Shanghai, China, September 19 – 20.

Wang, Yaping, Yanglin Wang & Jiansheng Wu(2010). Housing Migrant Workers in Rapidly Urbanizing Regions: A Study of the Chinese Model in Shenzhen. *Housing Studies*, 25(1), 83 – 100.

Zhang, Dandan(2009). Essays on Rural-to-Urban Migration and Its Consequences in Urban China. Ph. D. diss. , the Australian National University.

Why Doesn't the Apple Fall Far? The Theoretical Analysis on the Intergenerational Mobility of Migrants

Du Fenglian

(College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 Inner Mongolia University)

Abstract: The migration in China has created the largest labor flow in the world history. The institutional barrier such as household registration system has segregated the rural-urban migrants in terms of social status. The theory predicts that the segregation persists in the new generation of migrants without the exogenous policy interruptions. The results are as follows: Firstly, the lower the income and the return to human capital investments for migrants, the higher the intergenerational transmission of economic segregation. Secondly, the extended theory to encompass multigenerational transmission shows that the multigenerational effects will enforce the segregation. Thirdly, the weak social capital networks result in lower economic assimilation for migrants. Finally, the liquidity constraints also prevent migrants from assimilating with the local residents. The measures such as the education foundation for migrants are in great need to be taken to facilitate the intergenerational mobility.

Keywords: migrants, economic assimilation, intergenerational transmission

JEL Classification: J18, J61, J62, H55

(责任编辑:王姣娜)